

妮的提琴



Melanie's Violin

何 宁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米拉尼的小提琴
Melanie's Violin

何 宁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SBY17/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拉尼的小提琴/何宁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7

ISBN 7-5059-4585-8

I.米… II.何…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7455 号

书 名	米拉尼的小提琴
作 者	何 宁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莹
责任校对	李 丹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15.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585-8/I·3574
定 价	24.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作者的话

1

一九九八年年底的一天晚上，我收到洛杉矶《犹太新闻报》主编菲尔·布雷泽先生（PHIL BLAZER）打来的电话，说是翌日上午上海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制作小组要对他进行摄影采访，希望我能够到场，在必要的时候协助他沟通。

这次采访很郑重，内容是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大屠杀逃往上海。后来不久，我就看到了这部制作得十分认真的文献片，片名叫做《亡命上海》（*FLED TO SHANGHAI*）。

在那天采访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上海电视台的采访人问道：“您能否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德意志民族——一个在历史上有着高度的文化的民族，为什么却对犹太民族做出大屠杀这样残忍的事情来？”

布雷泽回答道：“您的提问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同样在历史上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

事情——拯救了近四万犹太人的命。这就是你们中国人！”

当时，我坐在后面，心中非常感动。这种感动便成为了我日后力图用写作的方式来表现这段历史的第一次冲动。

二〇〇一年，我从中国回到美国，几天后去看望菲尔。菲尔托我为好莱坞的著名电影演员保罗·纽曼创作素描肖像，他同时提出在上海的虹口区，当年日本人建立的“犹太隔离区”的旧址上竖立纪念雕塑的设想，并且委托我来设计这个雕塑的草图。他说，这是洛杉矶犹太社团代表全世界的犹太人送给上海的礼物，用以感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难民的拯救。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并且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光荣。由此，我又开始翻阅上个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有关上海犹太人的书籍资料。

在这里，我要感谢洛杉矶犹太大学（THE UNIVERSITY OF JUDAISM）图书馆给予我的帮助。我不但得到了特殊的借阅许可，而且得到了图书馆的海依姆·葛沙克（HAM GOTTSCHALK）和保尔·米勒（PAUL MILLER）的全力支持。海依姆的父亲便是当年逃亡上海的犹太难民，我从海依姆先生那里得到了特权，一而再、再而三地续借有关书籍。而保尔则帮助我查找到图书馆里全部的有关上海犹太人的书籍报章。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所获得的参考资料已经远远超过了创作一座纪念雕塑的需要，但是这些书籍是如此吸引着我，以至于我依然津津有味地将它们通通读了一个遍。这次阅读是一次热身和素材的储存，而文学创作的计划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还非常感谢中国IBM公司的郭维德先生（VICTOR GUO）。他几年如一日地为我寻找着有关上海犹太人的史料，哪怕是报刊上的一篇短文，都用快递寄到我的手里。我在美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文资料都是由他找到的。在我于两年前回到中国之后，他又利用每一次到国外的机会，为我收集了大量的英文的图片书籍。他曾经特意跑到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为我收集资料。这些麻烦而且细致的事情是年复一年始终如一的。我在这里向他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想说一声“谢谢”的人还有很多：

上海虹口区外事办公室的负责人陈俭先生。两年前他邀请我去上海，带领我去参观了当年所有犹太难民的旧居，使我获得了非常难得的感性知识。这几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一直为我的写作打气加油。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他赠送给我的由他主编的大型文献画册《犹太人在中国》，对我的帮助极大。

德国朋友白莎（ELISABETH KASKE），她在搬家的忙乱之中为我查找德文资料。

2

关于小说本身，我想说明几点。

第一，这段历史发生的地点、空间和人群都很小，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又如此之近，这样的情况其实留给小说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在收集有关“上海犹太人”的资料的同时，我又翻阅了其他的一些有关二战中类似内容的作品，像《安妮日记》、《这个孩子应该活着》、《拉贝日记》等等。两年前，我有事去香港，在书店里偶然买到了被译为《战地琴人》这本书，是电影《钢琴师》的文学原作。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这部非常出名的电影。书很薄，所以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便一口气读完了。那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惨场景竟然被如此平静与客观地描述着，人性的善良与丑恶，生命的坚强与脆弱，这淋漓尽致的一切令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于是，我想起了一个似乎已经被我们忽略的词，那就是“道德”。我们常常谈到性格，谈到人性的弱点，似乎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假如我们没有了人类道德的这道价值的底线——它的延伸便是正义，那么我们在这一切的面前便真的只有唏嘘的份儿了。

记得那一刻飞机正在云层上面飞行，远处是一片巍峨如山的云彩，在夕阳下染成耀眼的玫瑰色。我由此想到了自己，那时候我刚刚考虑将写出的电影剧本《逃亡上海》改写成小说。我没有写作方面的经验，一直犹豫不决。我想，我画了那么多有关犹太历史与现实的绘画，我又一再被上海犹太人的题材激动着，不论优劣，将它写出来是我的一种责任，就试一试吧！

当我真的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件事的艰难。好在我是个画家，艺术上的许多道理是相通的。遇到问题，我使用绘画上的法则时时提醒自己。比如，注意把握大的结构，情节的穿插不可分得太散；注意细节的刻画但不可过分，以免感到处处用力而太死；要努力保持戏剧性的张力与人物的性格塑造，等等。这样，等到我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这部小说，在电脑上打下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故事中的人物仿佛都成了活生生的真人，我的心中竟生出依依不舍的感觉。

第二，在国外呆了许多年，回国再看翻译电影，对于影片中外国人无一例外地说着一口“非常洋味儿”的中国话，听着十分别扭。可回想起来，我们自幼对于西洋文化与艺术的认知就是与这种“外国式的中国话”分不开的。那种装腔作势其实体现了译制人员对于“信达雅”之“雅”的追求，也是我们自己对于“洋”的理解。所以我想，我在本书里创造众多犹太人形象的时候，一定难以摆脱这种自认为“洋”之“洋”，我笔下的这群犹太人在本质上最终或许会是一群“非常洋气的中国人”也未可知。尽管我已经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

第三，犹太民族是一个宗教意识行为与世俗意识行为密切相融的民族，这其实也是犹太民族在近两千年的流亡史上历经磨难却依然凝聚为一体的根本原因。但是犹太教并不是开放的宗教，因此我对于犹太教的知识远远少于对于佛教与基督教的知识。但事实上，在上海的犹太社团里面，宗教活动对于社区生活的介入之深，产生

的力量之大,是我们从文化的根上便欠缺宗教意识的中国人所难以体会的。所以,我虽然也读到一些这方面的史料,但在小说中对于这些宗教方面的内容最终回避了,以免露怯。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

3

在历史上,犹太人最早以集体的方式选择中国作为自己的生息之地,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北宋后期,在时间上大致是公元十一世纪的时候。这批人大约有一千多人,据说是由印度经海路而来的。他们受到了大宋皇帝的欢迎,不但允许在首都开封定居,而且赐予了中国的姓氏。这些犹太人以经营细布和印染品为生,是十分成功的商人。

后来,在金大定三年,犹太人开始在开封买地兴建犹太会堂,取名为“清真寺”。犹太人围拱清真寺而居,渐渐形成了中国境内有相当规模的犹太社团。而这些教众也就被中国人冠上了“蓝帽回回”的别名。

在明朝年间,开封的犹太社团步入了鼎盛时期。人口也发展到了四五千。经济和政治地位也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于是,犹太人中间的知识分子渐渐放弃了犹太经典的研读而走向了努力跻身中国封建士大夫行列的方向。他们读孔孟之书,有许多人通过科举成名。随着这批人在全国更大范围的活动,犹太社团渐渐向中国的其他地区移动。后来,在几百年漫长的历史中,随着中国社会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变迁,开封犹太人渐渐失去了与外部犹太人的联系,融入了中国社会。

至于犹太人移居上海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中叶上

海塞法迪犹太人商贸社团的强力兴起。而这也是犹太人在历史上第二次以群体的方式大规模落户中国。

“塞法迪”是西伯莱语中对西班牙的称呼，所以，顾名思义，“塞法迪犹太人”便指的是历史上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后裔。

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受着罗马帝国残酷的压迫。在他们的反抗失败之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迫外迁，从此开始了犹太历史上长达一千八百年的“大流散”时期，犹太民族也由此成了没有祖国的民族。然而，在艰苦卓绝的流亡生活中饱受歧视与凌辱的犹太人，却依然顽强奋发地创造着自己灿烂的文化。塞法迪人和塞法迪文化就是这其中主要的一支。

至于来到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则主要是来自英国统治下的巴格达。他们是相当富有的商人和企业家。在这些中间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比如沙逊家族、哈同、嘉道理等等。这些人凭借出色的经商才能和在世界上的商贸联系，加之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从发展进出口贸易转而投资上海房地产和制造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上海滩最为活跃的工商团伙。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些人在上海形成了大约有八百至一千人左右的富足的塞法迪犹太人财团。

犹太人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中国是在上述的第二次之后不久，时间上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大批俄国犹太人为了逃避沙皇俄国的反犹暴行以及这之后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引起的内战而来到中国。他们从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到华北的天津，再南渐至上海，这些人是犹太人另一个重要的分支——阿什肯纳吉犹太人的一部分。

“阿什肯纳吉”是人们对于居住在莱茵河及日耳曼地区犹太人以及他们后裔的称谓。阿什肯纳吉犹太人所创造的文化便是人们所熟悉的意地绪犹太文化，而他们的日常用语便是众所周知的意地绪语。

来到上海的俄国阿什肯纳吉犹太人与巴格达来的塞法迪犹太人比起来穷得多，在上海经营餐饮杂货等等小型生意。他们渐渐富足

起来，成为上海的中产阶级。

这样，到了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在希特勒上台开始迫害欧洲的犹太人的时候，上海的这两个犹太社团的人数，发展到了五千之众。在上海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都为他们后来面临的救济欧洲犹太难民的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条件。

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向上海移民，却与近代史上的前两次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纳粹德国的排犹屠犹政策，使得犹太民族在一夜之间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许多国家或慑于法西斯的淫威，或由于自身实力的考量而袖手旁观，关闭了大门的时候，上海，却是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惟一的对于犹太难民不需要签证，便可以自由上岸的港口。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主要是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便如同潮水一般地涌进了上海。而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犹太难民又在日本人于虹口建立的“犹太隔离区”度过了一段艰险的日子。但是靠着自身的顽强奋斗与中国人民的支援，他们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其实，关注与了解这段历史，有一个方面却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犹太难民在上海强力的经济与文化活动对上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你了解了这些情况，便不禁对这个似乎永远处在逆境之下却永远自强不息的民族产生出钦佩之情。犹太社区带来的犹太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上海社会的生活形态。所以，回顾这段历史，会使我们联想到中国人和犹太人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共同经历的过去和现在。

三年前，布雷泽先生曾经给了我一份资料，是一篇报章的摘录，内容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犹太人又渐渐回到了上海，并且在时隔五十多年之后第一次举行了犹太式的婚礼。

何宁

二〇〇五年五月于北京

上 篇

从这里，我们被撵了出去，
在那里，我们又不能进入。
请告诉我吧！亲爱的天主！
这种日子究竟还要有多长？

——犹太哈希德教派民歌





一九四〇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意大利契斯蒂诺轮船公司的客轮罗斯号，载着四百三十八名由欧洲逃亡上海的犹太难民，经过三个多星期的海上航行，终于到达了上海。罗斯号的出发地是意大利的那布勒斯，准备一口气穿过苏伊士运河，绕过阿拉伯半岛进入太平洋，到日本的神户歇一歇脚之后，再鼓起余勇驶向上海。此时的欧洲战火连天，纳粹德国陆军的闪电战正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不甘于仅仅充当希特勒的配角，忙着表现独自的本领，突然从阿尔巴尼亚进攻希腊。于是地中海周边的邻国都绷紧了神经。

果然，罗斯号在起航不久便遇到了麻烦，地中海的洋面上已经封航，轮船到了塞浦路斯便被扣在了港口。深夜，当地的警察突然上船来施行检查，说是根据举报，船上有人正在贩卖军事情报。犹太难民们在惴惴不安中被折腾了一个星期之后，才得以重新上路。于是，当轮船终于由长江的吴淞口驶进黄浦江，这些逃脱了纳粹的迫害而一路上又饱受惊吓的犹太人，在望见上海外滩那一片招牌式景致的时候，心中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

黄浦江的船码头是十几座伸入到江里的栈道，这些栈道在外滩的南面一字排开，足足延伸出一公里还多。这里便是有名的“十六铺码头”。眼看罗斯号已经到了海关“大清钟”（注1）附近的水面，船却猛然停了，然后由领水船带着，转向江湾的水面上听候上海工部

局的安排。船长并不着急，他知道，不论是上海市政的英国人，还是在虹口驻扎军队的日本人，早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明令宣布，黄浦江已经对犹太难民船封港，不但船上的人严禁上岸，而且轮船公司也将被强制交纳高于往常十倍的罚金。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两艘船如同钻过网洞的鱼，载着犹太难民来试试运气。原因是这些难民已经在欧洲拿到了或者买到了由这里的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协助提供的船票。所以，该着急和忙着疏通关系的还是犹太人自己。

船上的难民们，已经从初来乍到的喜悦与好奇中恢复了常态，没过多久，便以犹太人那种特有的精明和务实，把客轮的甲板变成了小型的跳蚤市场。刚开始的时候，先是一些人在前甲板上低声交谈，做着买卖；后来，连第二层的甲板上也有人手里拿着物品叫卖。所不同的是，这个集市人来人往，但却是相当安静的。人们走路和交谈，都尽量压低了声音。交易的物品有金银首饰，钻石水晶，西装领带，也有人拿出上好的皮草。面对这样的情景，你一定以为人们对大上海充满了五光十色的憧憬呢。事实恰恰相反，这其实正显露出犹太难民们内心深处的忐忑不安。抓住最后的机会，再向钱包里多添一些现金；现金多一点，未来的安全就会多一点。

有一对一路上靠着给人剃头修面赚取每日饮食费用的理发匠父子，现在，干脆就紧靠着舱门摆起了摊儿，非常招摇地吆喝着，以先前要价的一半，给就要上岸的人们动作飞快地作最后的修饰。因为已经作了随时下船的准备，所以他们给顾客提供的方便也及时地简化成只是一把椅子和一面小镜子，而这面小镜子也是要顾客自己举在面前的。

天近傍晚，落日将江水连同两岸的天地都燃成一片橘色。罗斯号终于被允许靠岸了。不过，是在日本人控制的虹口，一个叫做陆公桥的小码头。

先上船来的是几名上海工部局的官员，他们都是绅士派头的英

国人，船上的广播喇叭随即响了起来，要难民们将行李留在舱里，全部到前甲板上集合。很快地，点名便开始了。同时，上海红十字会的医生与护士也到了，开始为人们注射伤寒和霍乱的预防针。点名的吆喝声夹杂着难民们叽叽喳喳的交谈声，甲板上仿佛又重开了乱哄哄的“跳蚤市场”。接下来，一位工部局的官员，像足球裁判一样吹起了哨子，开始宣读难民到达上海的注意事项——

为了保障刚刚到达以及先期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的利益，上海工部局董事会谨建议大家遵守以下注意事项。这些事项由海关执行并由运输的船舶公司协助。各位的任何疏忽或不当，不但会给人，也会给您的亲属及有关大众带来严重之后果。

这个开场白的措辞是相当严厉的。于是，乱哄哄的甲板上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江面上渐渐荡起浑浊的雾气。苦力在码头上加紧了忙碌的手脚。宣读注意事项的声音甚至在这儿也能够依稀听到。码头上，是成排的黄包车。稍远，停泊着成排的汽车。这是本地犹太人经营的米勒城市汽车运输公司的车队。再远一些，是几辆挂了日本军旗的挂斗摩托车，荷枪的日本宪兵牵着狼狗，沿着摩托车一字排开。再远过去，暮霭之中，甚至已经有妓女的身影在街角出没

了。

宣读注意事项的声音在继续着——

……禁止向陌生人及报刊媒体提供消息，

禁止与陌生人讨论政治问题，

依照军事理由，禁止在虹口地区拍照。

禁止在公共场所的不当举止，

禁止嫖娼，

禁止进入夜总会，

禁止赌博……

最后，官员温和地一笑，然后补充道：“另外，据我个人经验，

也顺便提醒大家，注意小偷。”他随即又做了一个手势，“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喝没有煮开过的生水！”

残阳在云彩的缝隙中最后闪了一下，天地随即暗了下来。这是一九四〇年深秋里的一天。距纳粹希特勒策划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所蓄意制造的“帝国水晶之夜”（注2），过去了整整两年。

2

小提琴家莱隆德·维森多夫回到一马路维克多丽娅小旅馆的时候，和刚刚打扫完房间的服务生撞个正着。

“您好！您回来了？”服务生用英语伴着职业微笑说道。忽然，他像忘记了什么重大事情一样又回到房间里面，将桌子上的台历“刷”地翻过一页，然后推着清洁车走了。

十二月一号！维森多夫心中一阵烦乱，这就是说，一眨眼他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十五天了！不对！如果算上刚下船的十一月十五号，那就是十六天了！

啊！上海！上海！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呢！在他乘黄包车四下里走动的沿途，他看到德国的领事馆，还有苏联、美国和日本的领事馆，居然是近邻，刺目的纳粹旗和苏维埃的镰刀斧头旗几乎就是并排地挂着。多么不可思议啊！他想。他的祖国德意志，把他当作要清洗的敌人，而那些敌人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却都在上海紧紧地靠在一起！他早就听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还被称做是冒险家的乐园，但是除去黄浦江边外滩的景致之外，给他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那些满街奔跑着的黄包车了。

那天傍晚，维森多夫随着大家下了船，迎面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规模有十几个人，排成两排的犹太小乐队。这是上海犹太文艺俱乐部的爱乐者，在义务做着欢迎难民的工作。他们演奏着一首又一首